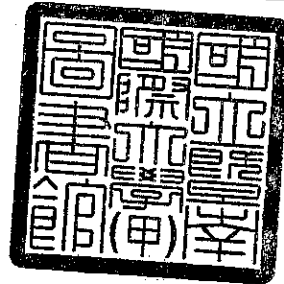


711
8472:2

歷史的轉捩點

古偉瀛 編著



暨南國際大學圖書館



C228901

 臺大出版中心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第十二講

公元1914年：兩次世界大戰

- 一、大戰爆發的原因
- 二、戰爭的發展
- 三、戰後的新世界格局
- 四、集權主義與集體屠殺的淵源與反省

我曾親眼目睹各種群眾性思潮——義大利的法西斯主義、德國的國家社會主義、俄國的布爾什維克主義——的產生和蔓延，尤其是那不可救藥的瘟疫——毒害了我們歐洲文化之花的民族主義。……目擊人類不可想像地倒退到以為早已被人忘卻了的野蠻之中，這是一種有它自己綱領性的自覺信條的反人性野蠻，使我們在經過了若干世紀之後，重又見到了不宣而戰的戰爭，見到了集中營、嚴刑拷打、大肆搶劫和對不設防城市的轟炸。……不過，與此自相矛盾的是，在這個使我們的世界在道德方面倒退了將近一千年的同一時代裏，我也看到了同樣的人類，由於在技術和智力方面取得未曾預料到的成就，而使自己大大進步，一躍超越了以往幾百萬年所取得的業績。且看：用飛機征服了太空；地面上的話可以在同一秒鐘之內傳遍全球，從而克服了世界的空間距離；原子的裂變戰勝了最險惡的潛伏疾病。……總之，作為整體的人類，未

曾露出過像我們所見到的那種惡魔般的猙獰面目，也未曾建樹過那種好像是神明創造的業績。

——史蒂芬·茨威格，《昨日的世界·序》

一、大戰爆發的原因

（一）歐洲協調瓦解

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奧匈帝國王儲斐迪南大公(Archduke Franz Ferdinand of Austria)遭到塞爾維亞民族主義激進分子暗殺。這件刺殺案，很快演變為國際危機，八月四日，歐洲主要國家，德、奧、英、法、俄都已捲入戰爭，世界大戰就此爆發。當時各國都以為不過是一場短暫的戰爭，對於解決原有矛盾不無好處。沒有人料到，在接下來四年的時間裏，將有三千七百萬人傷亡，而且再隔二十年，各國的矛盾也無法解決，還要再一次世界大戰，賠上數以千萬計的生命，才能獲得一個悲慘的結束。

造成這般不可收拾的後果，實有其長期的因素。自從拿破崙戰爭結束，在奧國偉大外交家梅特涅(Prince Von Metternich)的主導下，歐洲列強建立了「歐洲協調」的集體安全機制，透過共同協調彼此的利益以防止衝突與革命，因此維持了近五十年的和平。然而，隨著民族主義與自由主義的發展，這種保守冷靜的態度，開始受到嚴重的挑戰。其中最重大的改變，莫過於德國的統一。

兩百年來，日爾曼地區一直是歐洲戰爭的受害者，其中尤以法國對它荼毒最甚，從紅衣主教利希留開始(Cardinal de Richelieu, 1624到1642年執政)，法國就刻意

維持日爾曼地區的分裂。它的軍隊幾次入侵，至拿破崙戰爭達到頂點，日爾曼地區大約損失了百分之三十的人口。維也納會議後，梅特涅雖然依舊維持日爾曼地區的分裂，扼止普魯士繼續強大，卻已將原本三百多個小邦，合為三十多個。在他的考慮中，日爾曼地區應該既不強大，也不弱小，剛好可以作為大國之間的緩衝與屏障。然而乘著民族主義不可阻擋的浪潮，以及俾斯麥(Otto Von Bismark)精明的操作，普魯士終於還是突破梅特涅苦心建立的安全體系，逐步統一了日爾曼地區。

隨著一八七一年德國統一的完成，歐洲協調機制也告結束，那種集體安全互相妥協的精神，如今被現實政治所取代，正如俾斯麥所說「弱國將被強國吞噬」。新的局勢是建立在強權互相角力的不穩定基礎上。

（二）敵對聯盟形成

然而這並不是說，俾斯麥與德國必須為戰爭負責，德國統一是民族主義的產物，原本並不具有侵略性，而俾斯麥更是老謀深算，宣稱統一後的德國是一個「心滿意足」的國家，他並沒有順從民族主義的邏輯，試圖兼併所有日爾曼人居住的地區，而是盡力做到「持盈保泰」，維持德國的和平與安全。在此構想下，他首要防止的就是法國的報復。普法戰爭後，俾斯麥並未對法痛下辣手，提出過於苛刻的條件，（兼併洛林是一個例外，該地與亞爾薩斯不同，居民主要是法國人），他只是透過一連串的外交手腕，使法國在國際上受到孤立。

然而，新皇威廉二世(Willem II, 1888~1918在位)並不喜歡這種不求進取的政策，迫使俾斯麥下臺。威廉二世

追求更大幅度展現德國充盈的國力，主要反映在對外擴張殖民地與建立大海艦隊。這使原本保持中立的英國，感到大為不安，因為英國引以為傲的即是其殖民地與世界第一的海軍。德國甚至也鼓勵奧地利對巴爾幹半島發展，過去俾斯麥曾努力節制奧國，因為此舉會造成將巴爾幹視為禁臠的俄國不滿。結果就是，一心報仇的法國人，藉機拉攏了俄國，並一步步與世仇英國和解。德國因為自身國策的模糊，使其他國家感到不安，反過來也使自己惶惶不可終日，於是越發拉攏友邦，並建立多面作戰的軍力。若擁有能同時對抗多國的武力，即意味能輕易擊敗一國，於是各國也跟著結盟增兵，再加上本來在一個自由主義的全盛時代，以往貴族那種出於姻親情誼與教養的克制作風（尤其在外交部門中，此種貴族氣息特別強烈），已漸漸被平民的民粹主義風格所取代，各國遂把外交視為一種追求無限制民族光榮的手段。日後三國同盟與三國協約就是建立在這樣的背景中。

由於之前發生過眾多危機，一次大戰最後由一件單純的槍擊案觸發，也不會令人太過驚異。延遲至今，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從一八七〇到一九〇〇年之間，歐洲列強的殖民活動，無形中把各國的衝突緊張轉移到歐洲以外，甚至，英俄、英法等國結成同盟，除了因為德國的威脅，多少也奠基於他們在殖民地爭執中的妥協。一九〇〇以後，列強將海外土地瓜分殆盡，各國爭執焦點遂無可避免的回到歐洲本土，巴爾幹半島正是歐洲本土帝國主義角力之處，因此，這場戰爭的爆發，不能歸罪於單一國家或個人，實在是歐洲歷史長時間發展的結果，是在民族主義、自由主義、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等條件的配合下，一場難

以避免的悲劇。

相較之下，二次大戰的爆發，人謀不臧的成分便多了許多。基本上，二戰的起因，來自於一次大戰沒有解決的問題，而這些問題所以沒有解決，在很大程度上，必須歸咎巴黎和會三巨頭威爾遜(Woodrow Wilson)、勞合喬治(David Lloyd George)、克里蒙梭(George Clemenceau)與其國家的錯誤決策。

首先，威爾遜提出的民族自決，就是一種脫離現實的幻想，民族本來並無明確的界定，因此民族單位的劃分，實際上不免受到強權的操縱；另一方面，這些政治運作下新產生的「民族國家」，本身卻沒有建國的實力，而強國也不打算出力保護它們。

法國與英國，則在民意的報復情緒下，對德國提出過於苛刻的條約，包括許多不合理的領土變更，導致德國新政府無法在國內建立穩固的政權，因為它必須承受德國人民對和約的憤怒，於是給了激進的法西斯政權當政的機會。另一方面，那些德國四周刻意建立的民族國家，如捷克、波蘭，其力量既不足以達到牽制德國的作用，反而成為德國人仇恨的頭號目標，例如波蘭走廊，硬生生將東普魯士與德國本土隔開，日後便給了希特勒變更領土、對波蘭發動戰爭的藉口。無怪法國貝當元帥(Marshal Philippe Pétain)在和約簽訂後感慨地說：「這不是和平，是二十年的休戰。」

又如日本獲得山東半島，實際上也是列強運作的結果，這只是列強既無法貫徹民族自決，又不能認真面對現實政治的諸多例子之一。

二、戰爭的發展

(一) 德國人的戰略

長久以來，歷史學界輕視軍事技術發展的研究，認為戰爭只是長期根本因素的結果，然而僅從政治、經濟、文化等宏觀因素，並無法完全說明歷史何以如此進展。事實上，軍事技術本身的變化，往往足以決定歷史，兩次世界大戰就是極佳的例證。

由於國力的根本差距，德國面對東西兩面作戰的困局，勢必不能同時兼顧，唯一解決的辦法，就是先集中力量擊敗一方。一八九〇年代，德國參謀總長希里芬(Afred Graf von Schlieffen)，根據這個原則，判斷俄國雖然兵力龐大，然而受限於工業落後與交通惡劣，動員軍隊必定曠日費時，所以不會立刻對德國東線造成威脅。因此，他大膽地只留下十個師防守俄國，而將六十一個師投入西線，以期一舉擊敗英法。除此之外，鑒於德、法邊境很短，法軍又經營已久，防禦堅固，所以希里芬在德法邊境只留下八個師，而將其他五十三個師放在荷蘭、比利時邊境，計畫引誘法國為收復亞爾薩斯與洛林而攻擊德、法邊境的德軍；趁法軍主力進入德國時，德軍大軍一舉越過荷蘭、比利時，以壓倒性的兵力掃過英吉利海峽沿岸。如同旋轉門效應，當敵人推動一邊時，另一邊同時重重打回背上。這個計畫，由於繼任者的錯誤部署，使誘敵的軍力太強，而進攻的部分又嫌不足，所以儘管取得最初的成功，最後還是在馬恩河被英、法擋了下來，未能奪下巴黎。

然而二十年後，德國人在物質條件更惡劣的情形下，古德林(Heinz Guderian)首創將戰車集中編組為裝甲師，利

用戰車的機動性，出奇不意地由盧森堡的森林進入法國，直趨英吉利海峽，英法聯軍以為德軍會再次執行希里芬的計畫，開入比利時布防，於是他們與法國的聯繫遂被切斷。德軍以六星期的時間與六萬人的代價，便逼使法國在損失一百五十萬人後投降，英國則狼狽的從敦克爾克撤退，損失了所有的重裝備。西方盟軍其實也有戰車，而且數量與技術明顯領先，但他們完全不了解戰車的機動性，只分散拿來當步兵的支援武器。反觀德國，則完全是靠著傑出的作戰計畫，以及對裝備創新的運作，締造了單恃經濟與國力毫無可能的重大戰果。⁵⁵

(二) 全新的戰爭型態

就軍事史的觀點，兩次大戰中還包含了眾多轉換點。機關槍出現之時，英國人斥之為玩具；德軍觀察員霍夫曼(Captain Hoffmann)在日俄戰爭中，目睹俄軍使用機關槍對日軍造成的驚人殺傷力，便建議德軍銳意發展該項裝備，然而並未得到當局的全力支持，各國軍隊都還訓練大批騎兵，預備戰爭爆發後馳騁沙場。然而一戰打響後，人們才驚覺機關槍防守的威力，幾乎使任何進攻的行為形同自殺，從而造成戰壕對峙的局面，⁵⁶騎兵也從此退出戰場，成為歷史。

⁵⁵ 學者研究指出，二戰期間，德軍儘管經常處於裝備與兵力的劣勢之中，但無論攻守，都比敵軍展現更佳的作戰能力。史家有理由相信，若非希特勒在征俄時堅持錯誤的戰略，放棄對莫斯科的集中攻擊，德國人很可能建立連蒙古人都辦不到的歐亞帝國。

⁵⁶ 電影《未婚妻的漫長等待》與小說《西線無戰事》，鮮明地呈現了戰壕的慘況與機槍的威力。

戰車的運用標示著機械化作戰時代全面來臨。戰車最初的设计目的，便在突破戰壕僵局，因此著重防護和火力，但經過德國人大膽的運用與創新，成為現代陸戰中的王牌兵器，扮演突破防線、擴張戰果的要角。

此外，兩次大戰期間，德軍運用新武器潛艇，運用狼群戰術執行封鎖（即以多艘潛艇跟蹤、奇襲敵方船隊），逼使英國幾乎斷糧。太平洋上，山本五十六憑藉賭徒才有的大膽與巧思（他曾說：讓我在蒙地卡羅待一個月，我可以替日本贏一艘巡洋艦），以航空母艦偷襲珍珠港，最先改變了海戰的面貌。反而讓美國人充分認識了航空母艦的價值，在中途島之役，以劣勢兵力，一舉消滅日軍四艘航空母艦，奪回戰爭的主動權。太平洋戰爭期間，日軍的超級戰艦大和、武藏未曾擊沉一艘敵艦，只能充作艦隊司令的交通工具。

空權的重要性，是兩次大戰期間，最重要的軍事變革。一次大戰時，德國空戰英雄李希多芬 (Manfred von Richthofen)，以其無人能及的八十架擊落數，⁵⁷首次證明制空權對軍隊作戰的重要。一次戰後，義大利人杜黑 (Giulio Douhet) 出版《制空權》，首次系統闡述空軍的重要，他構想以長程轟炸機深入敵國的腹地，顛覆傳統的前線與後方之分，摧毀敵人的工業與士氣。到了二次大戰，德國空軍便以杜黑的理論為指導，配合地上戰車的攻勢，以俯衝轟炸機與傘兵，首次執行了今日美軍在伊拉克的作戰模式。

美國人利用其龐大的工業力量，更是把空權發揮地淋

⁵⁷ 史上空戰紀錄保持人是二次大戰德國飛行員埃里希·哈特曼，一共擊落三百五十二架敵機。

漓盡致，到了二次大戰末期，美國空軍每天數千架次的攻擊，迫使德軍戰車機動作戰的高手沙漠之狐隆美爾 (Elwin Rommel) 必須放棄大規模地面調動。美國更編組遠程轟炸機大隊，深入敵人後方數百公里，完全實現了杜黑的構想。⁵⁸

在空權崛起的基礎下，原子彈由B二九超級堡壘轟炸機丟下，開始了原子時代。原子彈是本世紀一連串物理學突破的結果，在二十億美元投資的曼哈頓計畫支持下，科學家將愛因斯坦 (Albert Einstein) 的質能互換定律，化為實際的應用，儘管人類在享受原子能之前，先嚐到其苦果，然而原子能所帶來大量便宜的動力，以及毀滅武器的恐怖平衡，無疑全面改變了人類的生活。

三、戰後的新世界格局

（一）冷戰格局的出現與美國的崛起

戰爭結果，使世界格局產生重大的改變，過去以歐洲為中心的世界，如今變成以美國與蘇聯兩強對峙的局面。許多西方學者指出，會造成這種局面，主要還是因為西方領袖錯誤的外交與國際戰略觀，先則在二次大戰前妄想誘使德國與俄國兩敗俱傷；到了戰爭後期，又堅持所謂的無條件投降政策，結果拉長了戰爭，又不能貫徹。美國對日本就放棄此政策，在確定美國會保留天皇制後，日本才投降。上述觀點其實表現西方主觀的看法。俄國在戰後的擴張，有其必然合理的原因，因為在戰爭的大部分時間，俄

⁵⁸ 其慘況亦是空前絕後，小說家馮內果的《第五號屠宰場》，便以美軍轟炸德勒斯登的慘案為內容。

國平均負擔德國百分之九十四的軍力，其犧牲也最大，可以說，沒有俄國，盟軍恐怕難以贏得戰爭，因此以雅爾達密約建立起來的戰後世界格局，並非皆是共產黨陰謀的產物，大致也反映東西世界力量的消長。

然而，美國成為二戰最大的贏家。在兩次大戰，它都占了後發制人的好處，等到局勢明朗之後，在關鍵時刻才適時投入全力，不僅避免了錯誤的消耗，也收到最大的利益，由於兩次大戰其本土都未受到破壞，⁵⁹因此當別國在斷垣殘壁中重建家園時，美國卻挾其龐大資金，投入世界各地的重建，從而掌握了世界經濟的大權，連帶地，美國價值也在經濟的基礎上，儼然成為世界的普世價值。但另一方面，美國高踞全球霸主之位，也付出了昂貴的代價。六十年代黑人民權運動者曾說：「當貧窮侵襲我們的社區，別忘了每年數百億美元花在核子潛艇的支出。」近來的九一一事件，也是這種過度擴張的代價之一。

（二）第三世界邁向自立

在兩強對立的大格局下，業已精疲力盡的老牌帝國主義國家，大都放棄了其對殖民地的控制，殖民地紛紛獨立建國，形成了戰後最鮮明的世界政治現象。然而正如美國外交家季辛吉(Henry Kissinger)所強調的，任何出現權力真空的地方，便會有其他的權力填補。因此殖民地獨立的過程，往往便是另一場血腥的開始。各地興起的本地勢力，必然與世界霸權產生關係，戰後廣泛發生在第三世界地區

的游擊戰（無論是共黨，還是所謂民主派），反映的其實是美、蘇兩國的對抗。新加坡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在殖民時代時，它是英國東南亞地區的行政金融中心。然而這種職能，在英國撤退後，便面臨馬來西亞，印尼等國的強烈挑戰，以及來自中國的共產勢力的衝擊。身為第三世界新興獨立國家的領袖，李光耀在回憶錄中，可以清楚地看見，他為了維護新加坡的地位，是如何透過盡力勸說英軍繼續駐防到一九七五年，以及要求美國進入東南亞，來維持區域的穩定。

兩次大戰作為歷史轉捩點，對於中國人來說，最重要的在於，經過八年的血戰，極度缺乏重裝備下，靠著慘重的犧牲（軍事人員死傷約三百萬人，平民約一千萬人），牢牢拖住百萬日軍，為盟國在太平洋的進展作出了難以取代的貢獻。除此之外，中國還派出軍隊，孫立人部隊在緬甸與印度的戰場中解救了盟國軍隊。事實證明，經過訓練與裝備，中國軍隊便表現堅強的戰鬥力，中國駐印遠征軍，便一舉收復緬甸，消滅了日軍號稱不敗的久留米師團。從而自一八四〇年以來，大致上恢復了主權的完整，完成了黃仁宇所說長時間革命的第一階段，為日後現代化提供了起碼的條件。中國開始以第三世界國家之首自居，便象徵著這種現代中國的興起。

（三）雙洲統合的出現

回到戰爭的主要地區歐洲。歐洲各國在歷經教訓之後，逐漸從西方即將沒落的哀嘆中站起，開始思考一種有別於民族國家偏狹主權觀的新世界體系，歐洲聯盟於焉成立。歐洲各國放棄部分主權，思考避免國家之間無謂的暴

⁵⁹ 日本在二次大戰時利用高空西風施放熱氣球炸彈，炸死了一家野餐的美國人，是美國本土唯一死於敵人的案例。

力，建立一種以生活圈為根本的新統治原理，這是世界歷史一個值得注意的重要變革。人類是否能就此避免戰爭，還需繼續的努力。

四、集權主義與集體屠殺的淵源與反省

兩次大戰期間，最令人怵目驚心卻又遺害深遠的現象，便是集權主義與大規模集體暴力。其中最惡名昭彰的，莫過於納粹統治與屠殺猶太人的暴行。同時，一次大戰的慘烈廝殺與史達林(Joseph Stalin, 1879~1953)的殘酷統治，都同樣使人困惑，何以會出現這些狂熱的暴行？

(一) 傳統的因素

要解答這個問題，必須回顧戰前整個歐洲的歷史狀況：無論是法西斯主義、國家社會主義，還是共產主義，都具有集權主義的性格。在此，集權主義可以被定義為——現代技術專家治理的國家對人民公私行為的完全掌控。德國和其他一些國家轉向集權的主要原因在於，它們的社會在沒有完全擺脫傳統時，工業化就已經有了很大的進展，傳統的體制和現代工業文明的要求未能充分整合，工業腐蝕了傳統體制的穩定，社會衝突與混亂也就因之而生。

十八世紀雙重革命——工業革命與法國大革命，造成巨大的人口與政治變化。受過教育的歐洲人自問：飛速增長與永不安寧的社會要如何才能得到控制，並重新步入歐洲文化的軌道上？一七七六到一八四八年的革命帶來一個線索：人民至上論，也就是民主。然而民主存在兩種變體，一個是自由主義，另一個則是集體主義。前者體現了洛克

(John Locke)的清教徒意識與個人主義；後者則表現盧梭(Jean Jacques Rousseau)和雅各賓(Jacobin)公共強制的觀點。自由主義後來發展為西歐的思想主流，強調代議政府、自由、平等和人權。集體主義產生了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它們要求廢除私人財產，物品的公共所有權和「真正的」平等。兩者都是啟蒙運動的產物，相信人可以通過經濟的富裕和對幸福的追求實現自我。好的生活被視為擁有物品的生活，只是在可能獲得好的生活的具體方法上，自由主義與集體主義有所區別。

然而民主的途徑，在德國等東歐、南歐國家，卻沒有導致自由主義的發展，這些國家的專制——君主傳統太過強大，民主的自由主義路線備受阻撓，集體主義則被接受，因為它強調普遍意志；並且，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可以和傳統觀點相調和，也就在此潛藏著集權主義：認為政治是救贖性的，有政治的共同模式，個人必須服從公共利益。

(二) 新的意識形態背景

在此同時，也就是十九世紀後半葉，所有的政治運動都受到三大潮流的影響。它們是民族主義、帝國主義與種族主義，這三者彼此之間又有關聯。民族主義原本帶有文化色彩，然而到了一八七〇年代，因為德、義兩個新興民族國家的形成，民族主義成為一種近乎宗教的、末世的運動，並以瘋狂的興奮和沸騰的衝動控制了民眾。在民族自決的旗幟下，政客激發了民族主義，成為帝國主義征服本質的煙幕。事實上，民族主義與帝國主義都是中產階級主導經濟秩序的產物，這種秩序為政治經濟的擴張調動整個民族。當國內市場在十九世紀末飽和乃至萎縮，資本家開

始向海外擴張，但控制殖民地需要調動大量資源，有賴國家介入支持。經濟控制，必然加劇對國內政治的控制。帝國主義富於集權主義的特徵，可以歸結為以下方面：1. 帝國主義加強了日常生活的軍事化，刺激了國內和國外民族和種族的衝突；2. 鼓動救世主的思想，將來自迫害「賤民」的殘酷及冷漠的心態注入到歐洲的社會結構中，為第一次世界大戰鋪平道路。

十九世紀晚期，民族主義和帝國主義也引起歐洲種族集團之間的仇恨。這些衝突表現在種族運動的激增，諸如泛德意志主義、泛斯拉夫主義。然而，因為歐洲大陸是一個極為分散的種族集團大雜燴，雖然不可能將所有的德國人合併到一個更大的德國中，或把所有斯拉夫人合併到一個類似的國家，但民族主義的發展作為一個強大的力量瓦解了跨民族的帝國，鼓勵了種族主義。

因為社會達爾文主義，十九世紀的種族主義演變為無所不包的意識形態。藉助達爾文的發現，公眾要求知道誰是最適合生存的，為什麼是適合生存的。人們輕率地認為，遺傳重於環境。亞利安至上論的先驅者豪斯頓·斯特沃德·張伯倫(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認為西方文化中所有偉大的東西都來自條頓民族，所有墮落的東西都是猶太人的影響。他的書在一次大戰爆發時銷售了十萬冊。在十九世紀晚期，種族主義與其他幾種不穩定的思潮相互激盪發揚。理性至上曾是啟蒙運動時代和十九世紀大部分時間的標誌，但卻面臨越來越多的挑戰。新思潮強調意志、非理性、主觀、直覺或者無意識在人類生活中的支配作用。對理性的反叛主要指向工業文明的精神，涉及到對城市狀態、技術理性，以及小資產階級生活普遍的馴服、冷漠、

乏味規則的深刻不滿。許多知識分子強烈地反對技術的非人性化，資本主義的貪婪、低級政治的危險，以及審美趣味的墮落，他們採取了深遠的反民主、反精英主義姿態。所謂的「文化絕望的政治」高度強化了歐洲社會集權主義的模式。在社會經濟面臨重大壓力的時代，人們對民主的方式極不耐煩，加上反理性思潮，而傾向回到集權的「美好傳統」。

對自由主義政治的厭倦是普遍的，人們越來越相信，議會民主促進了社會衝突和黨派紛爭。當十九世紀接近尾聲時，敏銳的觀察者注意到，對資產階級文明和價值觀的反彈正暗潮洶湧。然而這些文明和價值觀，正是議會民主、科學理性和資本主義的基石。如今，正如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著作中所表現的那樣，理性只是虛弱的外表，完全受到本能力的驅使。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堅持，所有生活形式的「真正的」決定性因素是無意識的意志，是一種「專橫欲求」的意志。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則使這一意志神聖化，讚美古希臘酒神的救世觀與對「墮落沒有憐憫」的超人統治。⁶⁰然而這種對現狀不滿所產生的懷古之思，並不能醫治人類心理的分裂，卻極可能轉變為攻擊負有責任的社會，促成了古代殘酷行為和各種的偏見。「權力意志」可能會被輕易的滲入雜質，從尼采對「精神的超越」或戰勝自我的信仰，轉變為野蠻的統治和侵略。一次世界大戰可以說是返古野蠻的大爆發。⁶¹

⁶⁰ 見匈牙利哲學家盧卡奇的名著，《理性的毀滅》，該書詳述德國哲學中非理性精神發展的過程。

⁶¹ 《魔戒》的作者身歷一次大戰之慘酷，在小說中，這種返古的野蠻，形象化的表現為魔君索倫與半獸人大軍。

假如民族主義和帝國主義意識形態的狂熱為二十世紀的集權主義提供溫床，那麼第一次世界大戰就是直接的催生者。戰爭極大地強化了國家的權力，全面控制人力和自然資源，自由主義體制因為國難當頭而被摒棄，政府以國家計畫經濟公開侵犯自由企業市場經濟的原則。正如約翰·彌爾(John Stuart Mill)所警告：國家權力的增長通常伴隨個人權力的減少。計畫經濟控制了公民的經濟生活，而個人自由與經濟自主是緊密聯繫的。假如國家是公民生活方式的決定因素，那麼個人就被剝奪了選擇的自由。

一次大戰留給集權主義的另一項遺產，是戰時宣傳發展出的制度性說謊機構。大多數宣傳機構與軍事指揮、警察、情報部門聯手，包裝支持親政府的媒體與公眾人物。戰爭與其結果釋放了極易喚起又極難控制的仇恨，互相說謊為數十年的不信任創造了條件。這種不信任對內成了集權的藉口，對外製造了侵略。

集權主義是一種努力，企圖重新獲得政治上的整一性，並且將分散的民眾和反社會的集團在政治上一致化。它要求通過更高的情感、想像和意志的服從，對人類社會加以改革。企圖通過回到美好過去，醫治內在的分裂，不斷喚起前工業社會的如田園牧歌般的美好價值。

集權主義又代表了二十世紀式的宗教，人民被迫生活在「規範的」生活方式下，且這種強迫並不依賴超驗的神，而是赤裸裸權力對自身正當性的辯護。

最後，集權主義跨越了意識形態的界線，史達林主義興於左，法西斯主義興於右，無論左與右，集權主義的特徵都一樣：無所不包的意識形態、一人領導的群眾大黨、恐怖的警察組織、壟斷的媒體和軍隊，以及受到集中指導

的經濟。集權主義都依賴大眾的支持，在歷史必然性的煙幕下掩蓋其真實目的。這也是海耶克(Friedrich A. Hayek)駁斥一般將法西斯和社會主義對立的看法。如他身歷其境的觀察，正是那些有良好願望的社會主義者，以集體主義的共同目標摧毀了自由主義的個人選擇，為納粹同樣邏輯的號召，打開了通路。回顧這段歷史，再看看今天社會的類似狀況，有必要特別注意，珍惜自由的成果，反對任何以民主之名而推行集權的主張。

(三) 歷史記憶與反省

第二次世界大戰最慘酷的集體屠殺，莫過於納粹殺害六百萬猶太人與日軍的南京大屠殺。這些屠殺都是在集權政府的統治下進行的。納粹著名的法學者梅茲格(Edmund Mezger)，竟以其聰明才智，在法理上證明猶太人不是人，因此可以迫害。而日軍在南京亦視中國人如草芥，任意凌辱殘害，軍官以砍人頭數打賭比賽，而日本報紙竟大為讚揚報導。

大戰之後，德國人對於戰時犯下的罪行，深自反省，不僅著於史書，政府首長也公開道歉，更以實際行動告誡後代，最近在柏林落成的納粹屠殺紀念館，可為明證。反觀日本，不僅竄改教科書，隻字不提南京大屠殺，即連侵略亦說成是「進出」，在戰後更以各種手段，否認戰爭罪行，祭拜戰犯，一味宣稱自己因遭原子彈轟炸，也是受害者。日本細菌戰調查團團長森正孝即指出：「日本許多人總認為自己是二戰的受害者，對青年進行教育時只講長崎和廣島。他們就是這種思考方法，原因在於日本從來沒有認真反省過，日本為什麼戰敗？而對發動戰爭的國家制

度，美國佔領軍都把它保留下來了。」又如著名的東史郎案。東史郎為侵華日軍士兵，戰後經商致富，反省自己在南京參與屠殺，乃出版當年日記，如實公布真相，卻在數年後遭日本右翼分子指控毀謗，而日本司法竟不顧事實歷程，判決東史郎敗訴，企圖以此否定南京大屠殺的存在。尚有多位日本歷史學家，秉持良心控告文部省竄改史實，亦是纏訟多年，未得到正式回應，在在可見日本缺乏反省能力。也正因為如此，儘管日本想要恢復軍隊，爭取進入聯合國安理會，本屬合理，卻引發亞洲各國的疑慮與譴責，深恐日本恢復軍國主義。這也提醒我們，要深切面對歷史的教訓，妄圖以一時的政治操作，抹煞歷史的影響，只會引來更激烈的反撲。

§ 作為轉捩點的兩次世界大戰：

- ◆ 戰爭結果，使世界格局產生重大的改變，過去以歐洲為中心的世界，如今變成以美國與蘇聯兩強對峙的局面。
- ◆ 重建家園時，美國卻挾其龐大資金，投入世界各地的重建，從而掌握了世界經濟的大權，連帶的，美國價值也在經濟的基礎上，儼然成為世界的普世價值。
- ◆ 殖民地紛紛獨立，形成了鮮明的世界政治現象。反映出來美蘇兩國的對抗。
- ◆ 亞洲地圖重劃，中國抗日牽制日本大軍，為盟國在太平洋的進攻作出了難以取代的貢獻，從而自1840年以來，大致上恢復了主權的完整，完成了黃仁宇所說長時間革命的第一階段，為日後現代化提供了起碼的條件。但戰後中國陷入內戰，中共建國，中國開始以第三世界國家之首自居，台灣脫離日本，但與日本共同成為冷戰時代美國的重要夥伴，直到今日。
- ◆ 歐洲人開始思考一種有別於民族國家偏狹主權觀的新世界體系，歐洲聯盟的成立，歐洲各國放棄部分主權，思考避免國家之間無謂的暴力，建立一種以生活圈為根本的新統治原理，是世界歷史一個值得注意的重要變革。

§ 參考文獻

1. 李德哈特著，《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史》（臺北：麥田，2000）。
2. 李德哈特著，《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史》（臺北：麥田，1995）。
3. 季辛吉，《大外交》（臺北：智庫文化，1998）。
4. 拉爾夫等著，趙豐譯，《世界文明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
5. 徐中約，《中國近代史》（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2）。

6. Klaus. P. Fischer,《納粹德國》(南京:江蘇人民,2005)。
7. 海耶克著,張尚德譯,《通往奴役之路》(臺北:桂冠,1982)。
8. 埃爾頓編,《劍橋世界近代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2003)。
9. 張亞中,《歐洲統合:超國家主義與政府間主義的互動》(臺北:揚智,1998)。
10. 吳圳義,〈兩次世界大戰的影響〉,《歷史月刊》144期(2000,臺北)。

§ 思考問題

1. 一次大戰前,歐洲各國以國家安全的理由大肆擴軍,建立保證摧毀敵國的超強大軍力,軍備競賽的結果是釀成了史上最慘烈的世界大戰。這齣歷史悲劇對於今日世人帶來何種啟示?
2. 集權主義的意識形態具有哪些特徵?具有理想性、理性的知識分子,應如何自覺地避免淪為鼓吹集權、摧毀自由的幫凶?

§ 延伸閱讀

1. 邱吉爾(Winston. S. Churchill)著,吳萬沈等譯,《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臺北:左岸文化,2002)。
2. 李光耀,《李光耀回憶錄》(臺北:世界書局,2000)。
3. 史蒂芬·茨威格著,舒昌善等譯,《昨日的世界——一個歐洲人的回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2004)。

4. 賽巴斯提安·哈夫納著,周全譯,《一個德國人的故事:哈夫納1914-1933回憶錄》(臺北:左岸文化,2005)。
5. Erich Maria Remarque,宣誠譯,《西線無戰事》(臺北:翻譯天地,1979)。